

目 录

余英时先生序	1
--------------	---

序论	1
----------	---

第一节 汉学发展史研究的难度和条件	1
-------------------------	---

第二节 对“汉学”及其相关概念的考察	4
--------------------------	---

第一篇 汉学的受容和展开

第一章 汉学的传来

引言	23
----------	----

第一节 中印文化交流的考察	25
---------------------	----

第二节 环中国海诸国汉学文化区	27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诸国汉学文化区	32
-----------------------	----

第四节 新大陆诸国汉学文化区	44
----------------------	----

第二章 早期汉学研究的特色(上)

引言	48
----------	----

第一节 朝鲜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49
----------------------	----

第二节 越南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52
----------------------	----

第三节 日本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55
----------------------	----

第四节 俄罗斯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58
-----------------------	----



第五节 其他	64
第三章 早期汉学研究的特色(中)	
引言	66
第一节 意大利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67
第二节 荷兰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73
第三节 法国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76
第四节 英国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87
第五节 比利时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90
第六节 德国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93
第七节 葡萄牙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97
第八节 捷克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99
第九节 瑞典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101
第十节 其他	103
第四章 早期汉学研究的特色(下)	
引言	105
第一节 汉学史研究分期和断代标准	106
第二节 美国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108
第三节 汉学讲座的设立	110
第五章 传教士对汉学的受容史研究	
引言	113
第一节 礼仪问题的由来	114
第二节 礼仪问题的派别化	122
第三节 礼仪之争的意义	130
第六章 传教士对汉学的思想史研究	
引言	133
第一节 语言文字学研究	134
第二节 中国古代史研究	142
第三节 中国思想史研究	154



第二篇 儒家文化圈所属国汉学发展史

第一章 儒家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 :《易经》为中心

引言 161

第一节 易学在古代朝鲜的传入和展开 163

第二节 易学在古代日本的传入和展开 169

第三节 易学在古代越南的传入和展开 180

第四节 朝日越三国的易学研究之比较 182

第二章 儒家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 :《论语》为中心

引言 185

第一节 《论语》在古代朝鲜的传入和展开 186

第二节 《论语》在古代日本的传入和展开 189

第三节 《论语》在古代越南的传入和展开 195

第三章 儒家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 朱子学为中心

引言 198

第一节 朱子思想在古代朝鲜的传入和展开 198

第二节 朱子思想在古代日本的传入和展开 205

第三节 朱子思想在古代越南的传入和展开 210

第四章 儒家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 历史学为中心

引言 212

第一节 中国史籍的传入和出版 212

第二节 中国古代史研究 216

第三节 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研究 219

第四节 史学理论研究 224

第五章 儒家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 道教为中心

引言 226

第一节 道教的传来 226

第二节 古代朝鲜的道教研究 230

第三节 古代日本的道教研究 234



第三篇 基督教文化圈所属国汉学发展史

第一章 基督教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 :语言学为中心

引言	241
第一节 汉语研究	241
第二节 汉字起源的研究	247
第三节 中外文对照字典的编纂	249

第二章 基督教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 :历史学为中心

引言	252
第一节 通史研究	252
第二节 断代史研究	265
第三节 专题史研究	268

第三章 基督教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 :宗教、思想为中心

引言	273
第一节 思想史研究	273
第二节 经学思想研究	280
第三节 专题研究	289

附录 参考文献目录	297
-----------------	-----

后记	309
----------	-----



余英时先生序

什么是“汉学”？这在今天已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认真地分析它，我们至少必须写一部专书。“汉学”的西文原字是“Sinology”。严格地说，它包括了有关最广义的“中国”的一切研究成果。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中国边疆和内地的“非汉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宗教、风俗、地理等方面的探讨。这样看来，我们用汉语中“汉学”一词来翻译“Sinology”不但取义过狭，而且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汉族中心论”的偏见。从字面上说，“Sinology”应该相当于中国人所谓“国学”的范围，但事实上，“国学”一词最初借自日本，在近代中国又另有演变，仍不能与西文原意吻合无间。日本学者曾用“支那学”译“Sinology”，在语源上最为忠实。“支那”这个梵文古字的初义似乎有褒无贬。然而，“支那”和“支那人”在某些近代日本人的使用中又添上了一层特别的含义。因此，“支那学”也不是现代中国人所愿意接受的。

语言的特质之一是“约定俗成”，中国自《荀子·正名》篇起，西方从柏拉图 Cratylus 篇起，早已揭出此义。所以我们不妨承认“汉学”即是“Sinology”的译语，不必再细加辨析。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却是我们无法完全回避的：中国以外的“汉学”和中国学人在同一领域中所发表的汉文论著究竟是属于同类的呢，还是异质的呢？据我几十年来体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多数中国学人，主要由于语文的隔阂，往往不免以异样的眼光看待所谓“汉学”的著作。有些先辈中国学者总觉得中国经典博大精深、文字古奥曲折，决不是



外国人所通晓的。在他们看来,外国人出于好奇心而研治中国学问,大概像张骞初至西域,不能得月氏的要领。章炳麟便曾流露出这一倾向,虽然他评论孔子、儒学仍不免受到远藤隆吉、白河次郎等人的影响。这一心态在当年自不是全无根据,但也未可过甚其词。王国维与日本林浩卿博士往复讨论《洛诰》中“裸”字之义,即可见一斑。如果说日本早有中国经史研究的传统,因此才能产生少数杰出的人物,那么我们还应该想到欧洲许多第一流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马伯乐和瑞典的高本汉,德国的卫礼贤、福兰阁等。尤其是伯希和与高本汉两位,对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学”的发展曾发生过决定性的影响。

这样看来,我们没有坚强的理由把“汉学”看作“化外”的边缘事物,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应该记得,在1930年代的北平,中国第一流学人如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便曾严肃地讨论过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汉学”的中心当时是在巴黎呢,还是日本京都呢?什么时候才能搬回中国北平呢?这个问题似乎在今天还没有确定的答案。

如果说,在19世纪中国人的学问依然自成系统,与域外的“汉学”截然异趣,那么在进入20世纪之后,情况已完全改变了。而且即使是在19世纪,英人礼雅格(James Legge)得王韬之助,将儒家主要经典译注成英文,便是世界汉学史上一大事因缘。1875年陈其元从香港的《华字日报》上看到这条新闻,大为兴奋。他因礼雅格竟能“研究马、郑、程、朱之学,用夏变夷”,便毫不迟疑地称其为“豪杰之士”。可见“汉学”即在彼时也未能一律视为“化外”。自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的“整理国故”运动以来,中国原有经、史、子、集四部系统已全面崩解,代之而起的正是西方的学科分类系统。从此,中国的“国学”和域外的“汉学”在实质上更难分疆划界,唯一可实指的差异只剩下发表论著时所使用的语文了。近几十年来就我阅读所及的范围而言,当时竟不免发生一个非常奇异的感觉:即有些中国学人以汉文写成的“国学”著作好像是十足的“汉学”成品,而有些外国人以



“非汉语”发表的“汉学”成绩反而体现了中国“国学”的风格。这就更不能不激起我们的反思了。

20 世纪下半叶,主要由于美国所投注的惊人的物力和人力,“汉学”发展的重心已明显地从欧洲转移到北美。更由于涵盖面的年限扩大和时代性的包罗古今,美国学人嫌“汉学”之名过于陈旧,主张用“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来代替它。在 1960 年代中期,“汉学”这个名词的本身曾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体上说,今天美国学人已很少用“Sinology”这个字了。即使在欧洲,“中国研究”也已有取代“汉学”的迹象。

名词之争的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从日本、欧洲到北美,每一天都有关于中国古今各方面的研究问世。如果我们继续把这些成果都称之为“汉学”,那么“汉学”与中国本土的“国学”已经连成一体,再也分不开了。学术和知识不分国界,这一原则今天也同样适用于一切有关中国的研究领域。1930 年陈寅恪先生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曾提“预流”与“未入流”之说。他认定“敦煌学”是当时“学术之新潮流”,中国学人必须急起直追。今天的“新潮流”则已扩大到中国研究的每一角落,不能再以“敦煌学”为限。域外的“汉学”已取代了当年“敦煌学”的位置。所以中国学者即使研究自己的“国学”也有“预流”或“未入流”的问题。以我稍有所知的中国史学而言,尚在选定专题研究之前不查清汉学界有关该题目的主要文献,我是不敢贸然决定的。万一在研究工作完成以后发现别人已先我为之,并且比我做得更好,那么我的时间和精力岂不完全浪费了?

我很高兴看到今天中国本土的学人已开始注意到域外“汉学”的相关性,虽然这一相关性目前还未能能在学术论著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改变中国学人长期以来对于域外“汉学”的先入之见并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办得到的。但有系统地撰述汉学史不失为一个最有效的始点。这一新风气最近似乎已在中国大陆上掀起了,这是最使我感到欣慰的。今



年我所收到的作者赠本便有张国刚先生的《德国的汉学研究》和张静河先生的《瑞典汉学史》两种,都是作者亲自在德国和瑞典深入考察访问后,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专著。这两部书都翔实可信,贡献不小。

旅日多年的京都静源(刘正)先生,英年好学,研究的规模尤为宏大。他最近发奋写成了一部包罗东西方各国的汉学研究史。这样一部通论性质的基础研究史,更是当前中国学术界所迫切需要的。我虽然还没有机会读到全稿,但从目录中看见他将汉学研究分系在“儒家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两大系统之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见解而又符合历史实际的设想。

我希望京都静源(刘正)先生此书出版后能够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回响。故略道平素所感,以当介绍。是为序。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余英时

1997年8月26日



序 论

第一节 汉学发展史研究的难度和条件

产生汉学的国度里至今还没有产生出一部汉学通史。就这一现象而言,不论是对于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研究的现代中国学者们来说,还是对于从事汉学研究的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们来说,都是一个十分不正常、又有点让人感到难堪的现实存在。在东西方汉学界,特别是在中国国学界,近百年来已出版的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哲学史、古代史等方面的各种文字和各个学科、各个研究专题的通史体学术专著的数量之多,说“汗牛充栋”也许并不过分。但是,作为通史体汉学史专著,直到今天也没有正式的出现。究其原因,那是因为进行汉学通史研究有以下五个问题存在。

第一 东西方语言的素养问题

研究汉学史,至少要能直接阅读日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这五种汉学发展史上重要的工具性语言的外语论著,必要时还要注意到西班牙文、拉丁文、荷兰文、瑞典文、捷克文等参考性语言的外语论著,才有可能把东西方汉学发展史上的主要学派及其思想、发展脉络说明清楚。在其他学科来说,外语是了解同一研究专业国外学界的研究动态、掌握同一研究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的便利手段之一。而对于汉学史的研究来说,外语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必备基



础。多掌握一门外语,研究的视角和利用资料的范围就获得了极大的开拓。

第二 传统国学的素养问题

研究汉学史,需要有关学者对中国古代传统国学具有精湛的了解。至少应对中国古代文、史、哲领域中的某一门具体的学科有成体系的见解,才有可能利用其学之所长对东西方汉学发展史上与此有关的学术受容史和思想发展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个对传统国学感到陌生的人,不可能形成一种能反映传统国学的本质特征的汉学史观,他掌握的外语种类多少,已经失去了实际应用的意义。

第三 西方思想史的素养问题

作为汉学史的主要构成之一的西方汉学史,其形成和发展都和西方社会主要思想(特别是宗教思想)有直接、间接的联系。一部西方汉学史,与西方社会中基督教各流派和思想在中国流传和发展的历史、与西方传统史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是密切相关的。近现代东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使得汉学家们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西方思想史上的主要思潮。因此,了解西方思想史对于解读东西方汉学家们的汉学思想有直接的辅助作用。



这是在安阳出土的刻有文字的牛的肩胛骨。商王武丁(约公元前1250年)几次让人用这块卜骨来进行预测(如“未来10日内会不会有什么灾难”),并记录下占卜后发生的实际情况。所记录的事件中有一次死亡和一次狩猎事故。

第四 各国汉学史的分期问题

由于汉学传入东西方各国的时间并不一致,而且传入时的内容又有汉字、儒家经学、道教、古代文史著作、中国式礼仪和风俗习惯等多种形式的不同,增加了对比研究的难度。仅就儒家经学的传入而言,就有各自独立的三经、五经、六经、七经、十三经的不同内容和流传史、受容史现象存在。要想找出一个统一的对比标准是不太容易的。说是“挟泰山以超北海”,或许并不过分。

因此之故,我在此依汉学传播时间的先后和地理位置的不同,把东西方汉学发展史分成环中国海诸国、丝绸之路



诸国和新大陆诸国三个汉学文化区,进行地域性比较研究。在每一个地域范围内,又从所在国对汉学的受容形式上,分为儒家文化圈所属国和基督教文化圈所属国两种性质,以上述三个汉学文化区的区分和两种性质的文化圈所属国,作为构成本书的主线。

第五 汉学发展史的连贯性问题

因为东西方各国的汉学家们,依时代的差异,各自对汉学进行受容和研究的重点不同,故而无法在东西方各国各自独立而又完整的专题研究中找出一个总体发展线索。如有关中国古代文字的研究在这个国家这一时代里是重点,到了那个国家那一时代里就可能完全没人提及。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汉学家们对传统汉学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从元代开始,西方国家大量的传教士来华,使得蒙古学、西夏学、藏学的研究也同时兴起。但在12世纪以前,汉学的研究范围中几乎不存在蒙古学、西夏学、藏学的地位。

因此之故,本书尽可能以对传统汉学(国学)的研究为重点展开对东西方汉学发展史的叙述。当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国学(特别是经学)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与此相应的是:传统汉学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西方汉学家们所谓的汉学在19世纪初期才正式形成的传统观点是有可取之处的。

在本书中,具体地说,即以1900年以前东西方各国汉学界对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中国古代史及史学史的研究、中国思想史(特别是经学史)的研究、道教和原始宗教信仰的研究为核心,构成了我所谓的比较思想比较文化角度上的汉学通史。以上研究也是构成传统国学的极其重要的核心组成。

有关东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对中国佛教思想的研究,目前已经属于国际性热点学科之一的比较文学、比较思想研究的课题。而当前的中国学术界存在着把汉学史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研究的现象、在国际学术界存在着把佛学史研究等同于比较思想研究的现象,这是我



本人极力反对的。在本书中、在我所理解的汉学通史概念中,比较文学和比较思想的“汉学史研究”,就像蒙古学、敦煌学、藏学、西夏学一样,只是构成传统汉学的重要分支,我有意不去触动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史,就是要揭示出汉学通史研究和比较文学、比较思想研究的不同。

第二节 对“汉学”及其相关概念的考察

汉学,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曾有种种名称。据笔者的统计和研究,大致有以下十种名称,现分别予以详细的说明。

第一 汉学

① 见 Gaoting Herbert Franke 提交台湾主办的“1992年欧洲汉学史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古伟瀛译。

汉学,即英语中的“Sinology”,又被称为传统汉学、古典派汉学,一般认为是指对中国古代语言、思想、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汉学的概念在19世纪才正式形成,到1838年才开始出现以“Sinology”一词来说明“汉学家”这一概念。而以“Sinology”来指代汉学,德国汉学家福赫伯博士(Gaoting Herbert Franke)曾在《对欧洲汉学史的一些看法》中提出:“在1882年才正式出炉。”^①

日本汉学家福井文雅博士在《欧美的中国研究史》(《欧米の中国研究史》)一文中引证:“以法语来写为 Sinologie,以德语来写为 Sinologie,以英语来写为 Sinology 或者是 Synology,发音即使是有点变化但总有一点是共同的:在以 Sino(支那)作为语源这一点来说是不变的。”^②

② 福井文雅:《欧米の东洋学と比较论》,隆文馆,平成三年(1991)。

有一种相当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顾名思义,‘汉学’,应该是所有有关中国的学问。”^③这种说法是不切合实际的。

“汉学”在中文里的意义有三种:

③ 王佳晴:《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述评》,见《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

1. 指汉代的学术以及对汉代的学术和思想、文化进行研究的专门之学。

2. 指和“宋学”相对出现的、专指以阐述汉代的学术和思想、文化为核心,并以汉代的官方传统经学的治学方法为工具的一种研究古代文化、思想和学术的专门之学。



3. 指外国人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和文化进行专门研究之学。

因此之故，“汉学”是不能理解为“所有有关中国的学问”或“汉民族之学”的，而且把“汉学”理解成“所有有关中国的学问”实在是出于无知。因为中国是个大概念，西藏、西夏和蒙古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国际上正成为显学的藏学、西夏学、蒙古学、满学等也是属于“所有有关中国的学问”之一的，但他们绝不是“汉学”！以为“汉学”是“所有有关中国的学问”这一“泛汉学”现象和以为“汉学”只是“汉民族之学”这一“大汉学”现象都是要不得的，都是对“汉学”本义的误解。这是我在此要特别强调说明的两点。

但是，汉学家本人的确有过在大学里讲授“所有有关中国的学问”的时代。已故哈佛大学(Harvard)历史学教授杨联陞博士曾说过这样的话：“早年在美国的大学里教汉学的中国人就像杂货店里的打工的小伙计。”^①但这是就当时汉学教学的实际情况来说的，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王佳晴博士才有上述之说。而这一现实和汉学的定义并无直接关系。

还有一种观点以为过去使用的“汉学”概念过于狭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只有“中国学”这一概念才能和实际情况相一致，亦即以为：“把 Sinology 的中译名订正为‘中国学’，其必要性绝对不可等闲视之。”^②

又见萧师毅氏《德国的汉学研究》：“汉学为中国学之一部分。”^③

试问：一门学科的名称和中译名怎能如此订正来、证正去？任何一门学科的内容都会和时代的发展相一致而发展，难道都要重新订正一下名称？在过去数百年中使用“汉学”并没有出现任何误解，后来出现“中国学”、“中国研究”或“中国问题研究”等名称后，如果在使用中前后二者有矛盾，只能是后人在“中国学”、“中国研究”或“中国问题研究”之研究内容和所下定义方面的失误，和前人所使用的汉

① 杨联陞先生之语为余英时先生向笔者转述。

②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

③ 萧师毅：《德国的汉学研究》，见《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台湾“国防研究院”，1962年。



学、和“Sinology”本身之定义和研究内容是无关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纂出版的堂堂《世界中国学家名录》居然如此不合逻辑,而且,该书对日本汉学家的介绍实在不能使人相信这就是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所掌握的情况!

我个人主张以“古典派汉学”和“现代派汉学”两个术语来说明“汉学”和“中国学”的区别和联系。其中,前者又可称为传统汉学,后者又可称为中国学。研究藏学、西夏学、蒙古学的学者不应称其为汉学家或中国学家,尽管西藏、西夏、蒙古一直是中国领土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对学科的定义及使用范围的区别和国土所属是内容不同的两个概念。当务之急是清理汉学、中国学学界中的上述我所谓“泛汉学”现象和“大汉学”现象,使学者对定义的使用规范化和准确化。

1814年12月11日,西方汉学史上第一个汉学讲座在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正式设立,并由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博士(Jean Pierre Abel Remusat)主持。这就是作为“Sinology”意义上的汉学在西方的起点。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冯燕氏编著的《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一书中却声称:“大约从本世纪起,国外已经建立了比较科学的中国学研究。”^①这里所谓的“中国学研究”如是指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博士(John King Fairbank)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或许是正确的。但该书作者指的显然并不是这一意义上的“中国学研究”,因此是不适当的,和上述事实不相符合。

① 冯燕:《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中华书局,1981年。

第二 儒学

儒学,在英语中一般被称为“Confucianism”(或“Confucianist”)。在东西方儒学史的研究中,儒学并不是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特定说明。中国儒学之外,朝鲜儒学(如退溪学)、日本儒学(如朱子学、阳明学)等也是儒学史的研究范围之一。但是在汉学史的研究中,儒学在古代东亚社会里,



特别是在古代日本和朝鲜,作为汉学的一种指代,则是指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专门研究之学。朝鲜儒学、日本儒学等则是朝鲜思想史、日本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汉学史研究只可参考其部分资料,不必顾及全体。具体地来说,有所谓“支那儒学”的概念,实是“支那思想史专题研究”的简称。在中国学术界,对儒家、儒学、儒教的具体定义和使用区分至今仍时有异论出现,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核心基础,“儒学”的概念为国际汉学界所通用。其主要内容是以传统的十三经为核心、以历代思想家们的经学著作作为辅助而展开的对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和著述。这也是我所理解的汉学史意义上的儒学。

但是,在古代的东亚社会里,儒学确实曾是汉学的特殊名称。在古代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接受儒学和研究、解释儒学是了解汉学的一个途径,并且由此又开始了对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的了解。直到今天,在亚洲,在欧洲,在美洲,儒学仍然被看作是汉学的核心组成。与儒学有关的训诂学、文字学、汉清朴学、宋明理学等仍然是汉学研究的重要代表。

第三 华学

华学本来是从俄罗斯汉学史中产生出来的概念。在俄语中以“Китайстика”来表示,但其具体形成时间则迄今不甚清楚。这一词是由俄语“Китайский”即“华夏”一词发展而来的。因为中俄边界和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华学最初不但指对古典汉学的研究,也包含了对中国的西北史地之学、蒙藏之学的研究。特别是在清代中后期,为适应俄罗斯帝国的侵华政策,俄罗斯的学者们和传教士们对中国近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以及中央政府和边疆地区的所属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称之为“华学”实是有华夏之学、中华之学含义在内的。这就是俄国的汉学被称为华学的根本原因吧。如俄罗斯帝国时代著名汉学家比



16世纪孔子象牙像。即使被尊为圣,这位中国大师仍认为自己是世俗思想家,而非宗教先知。他有一次说道:“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



丘林教士(ГичуринЯ. Иакинф)就是以汉学、蒙古学、中亚史研究为中心的学者,由此又形成了俄罗斯汉学史上著名的比丘林学派。

但是,在中文中亦有“华学”这一概念。1861年,清代的留学生郭栋臣氏在意大利时,曾以意大利文著成一书,中文书名为《华学进境》。此书以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思想的介绍为主,是为来华传教的意大利教士们而作的介绍中国国情的小册子。但郭栋臣本人是基督教信徒,这一概念从何而来,难以定论。

第四 支那学

“支那”这一概念,从语源学上讲,来自梵语佛教典籍中的“Ch'in”一词。其本意是“秦”,它是古代印度用来指代中国古代秦王朝的专门术语。在古代印度的史诗《摩诃波罗多》(Mahabharata)一书中已有“支那”一词出现,这就是今天英语世界中“China”一词的直接来源。在西方汉学史上,德国汉学家李施霍芬博士(Ferdinand Richthofen)曾主张“China”一词来源于今天的越南地区。此说也许有点根据吧。因为秦汉之际的社会动乱之时,曾有不少中原人避难来到当时的安南(即今天的越南)地区。英国汉学家拉考派瑞博士(Terrien de Lacouperie)以为起源于今天的云南地区。但他是以上古时代云南印度贸易来往的历史角度来定论的。如能成立的话,也只说明印度的“Ch'in”即是由云南传入的“秦”。法国汉学家考狄博士(Cordier Henri)甚至认为《旧约全书·伊赛亚书》第四十九章中的“Sinim”就是指“Sin”、“Sinai”,即指中国。此说的成立没有充分的汉文史料证据,只说明了比较语源学上的一个可能性问题。

日本汉学家岩村忍博士在《13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一书中说:“但是,有关‘Sin’、‘Sinai’等语源的通说,都把‘秦’作为其起源。此说是根据‘秦’的北京音ts'in(通俗的chin)而来。这一音中的ch的发音是由不发ch音的阿拉伯人传向欧洲成了Shin、Thin的发音,更进而形成了Sinae、



法国著名的汉学家考狄博士(Henri Cordier 1849~1925),他的五卷本《汉学书目》是西方研究汉学的权威著作。



Thinae 的发音。”^①

在古代语言世界里，“支那”一词又有“Sin”、“Sinai”、“Sinae”、“Thin”、“Thinai”等读法。日本汉学家青木富太郎博士在《东洋学的成立及其发展》（《东洋学の成立とその发展》）一书中以为：“‘支那’的语源分为两支，一支是由陆路传来，读音为 Seres 或 Serike。一支是由海路传来，读音为 Sin、Sinai、Thin、Thinai。”^②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博士在《欧洲的中国研究》（《欧人の支那研究》）一书中也曾持有同样的观点。这一考证是可信的。本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把东西方汉学发展史按地理位置分成环中国海诸国（所谓“一支是由海路传来”）、丝绸之路诸国（所谓“一支是由陆路传来”）和新大陆诸国（和“一支是由海路传来”的相同）三个汉学文化区的。

因为丝绸之路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支那”和“丝绸”的含意紧密相关，并一度成为“丝绸”的代称。而“China”一词又有陶器的意义则又在此之后了。张静河氏《瑞典汉学史》中也介绍说：“希腊语明确地称中国为 Serices 称中国人为 Seres。在拉丁语中，中国被称呼 Sen，中国人则被称为 Sinai。两种名称都是从西方人称中国丝绸为 Serikon 或 Sericum 演变来的。”^③

这里，希腊语中的“Serices”、“Seres”和拉丁语中的“Sen”、“Sinai”，以及“Serikon”或“Sericum”的概念，都和“Serindia”之名有关。从语源学的角度上来说，“Serices”、“Seres”、“Sinai”、“Sinae”、“Serikon”、“Sericum”、“Serindia”、“Sen”等都有一个共同的词干“Ser”。而“Serindia”一词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笔下，如著名的《地理学》（Geographice Hyphegesis）一书，指位于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之间的地带。这一地带即所谓的“西域”和“中亚地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这一地带自古以来就是来华和去欧的中西交通必经之路，进而也是汉学和西方各国、中亚各国进行文化和思想交流的一个窗口。20 世纪初的汉学家们的中亚考古、敦煌学的兴起等等，都与此有关。

① 岩村忍：《13 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三省堂，昭和十四年（1939）。

② 青木富太郎：《东洋学の成立とその发展》，萤雪书院，昭和十五年（1940）。

③ 张静河：《瑞典汉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 年。

